

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忆抗战生活片断	千家驹(1)
云南起义经过纪实	林毓棠(19)
卢汉传	林南国 孙代兴(51)
贾汪起义与一三二师行动经过	过家芳(70)
我参加招商局护产起义的经过	胡时渊(98)
我的自学小史	梁漱溟(121)
逃出殷汝耕樊篱的经过	霍实子(150)
同盟国胜利游行追记	高 光(164)
台湾高山族(阿眉斯)的风俗习惯	林登仙(169)

订正与质疑

对第五十二辑《回忆编遣会议》一文的质疑	俞兴茂(189)
------------------------------	----------

忆抗战生活片断

千家驹

第一次流亡香港

一九四一年春，我第一次流亡香港。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在太平洋战争以前，香港又是中国富豪的安乐窝，我国内地正是烽火连天，而香港却歌舞升平，纸醉金迷。当时住在香港的，有的是不满意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的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他们团结海外侨胞，支援抗战，如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给八路军捐款捐物，便以香港为据点。有的是富商大贾，他们既不甘心在沦陷区做日本人的顺民，又怕后方生活太苦，吃不消艰苦抗战的日子，暂以香港为栖身之地。还有的是与敌人勾勾搭搭，受蒋介石的委托，做政治掮客的。还有一些上海的大小流氓头子都在香港过着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皖南事变以后，香港又成为国内政治避难者的圣地，正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伦敦成为大陆政治流亡者的耶路撒冷一样。英国是老牌的“民主政治”的国家，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多少保留着大英帝国的这一传统。当然，这是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但比起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来，在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方面，却真有天渊之别。在香港，只要你不反对英帝国主义，不煽动香港工人罢工，不在当地搞游行示威，不扰乱他们的所谓“治安”，一般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是有法律保障的。你用不着担心半夜里特务敲你的门，也不会无缘无故的失踪。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头号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自然没有

必要在香港散布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言论，更不会在香港煽动阶级斗争，因此上面这些戒律对我们来说是不发生困难的。反之，如果触犯了这些戒律，那么，不管你是谁，香港政府都要严厉取缔的。例如抗战时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在香港私设电台，结果被香港政府驱逐出境，尽管孔祥熙是当时蒋介石政府的行政院长。又如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有一次路过香港，被港警务处知悉后扣留了一夜，因为戴在这里搞过暗杀活动。

皖南事变后，流亡到香港的朋友愈来愈多了。据我现在所记得的有：邹韬奋、沈雁冰（茅盾）、廖承志、乔冠华、张友渔、范长江、夏衍、梁漱溟、萨空了、陈翰笙、陈此生、杨东莼、沈志远、胡绳、徐伯昕等。金仲华是早已在香港，主《星岛日报》笔政。胡愈之已去了南洋，办《南洋商报》。《大公报》老板胡政之是一九四一年秋季从重庆来香港的。

我到了香港之后，先住在冯和法处（九龙弥敦道乐道）。冯和法为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当时在香港与友人李振院（亦农研会会员）一同经营商业，他本是一个文化人，但长袖善舞，做生意也得心应手。他慷慨大方，思想进步，对朋友非常热诚，肯济人之急。我在乐道租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既没有职业，只好以卖文为生。此时香港已成为海外文化中心，办了不少报刊可以投稿。以报纸来说，就有两个报纸，一为华商报，地下党所办，由范长江为社长，廖沫沙编副刊。还有一个《光明报》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由梁漱溟任社长，萨空了为经理。

说起《光明报》来，它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诞生有密切关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它是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以外的几个小党派的联合组织。初成立时，包括所谓三党三派。三党指以张君勱为首的“国社党”，以曾琦为首的“中国青年党”，以章伯钧为首的“农工民主党”。三派指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派”，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而救国会（以沈钧儒为首）则不在内。他们认为救

国会色彩太“红”，怕参加在内会被人目为共产党的“尾巴”。其实“国社党”与“中国青年党”是思想非常反动的政客集团，与国民党顽固派本是一丘之貉，其所以要于国民党之外另成立一个小党派，不外是想分润国民党政权的残羹余沥，获得一官半职而已。以后这两个小党派在政治斗争中逐渐暴露其与国民党同流合污的反动本质，被民主政团同盟清除出去，另一方面，进步的“救国会”成员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则大批参加了进来，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一年春，三党三派联合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要负责人张澜、张君勱、黄炎培、章伯钧、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等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色彩温和的政治组织，也无法得到蒋介石政府的承认，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先在海外（香港）公开，再回到国内去争取合法地位。梁漱溟就负着这么一个使命来到香港的。梁漱溟于一九四一年五月下旬抵达香港，在中共驻港办事处的具体帮助下，开始筹备出版报纸。九月十八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正式出版。《光明报》三个字是梁漱溟所题签的，以梁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颂华为总编辑。十月七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业经在重庆成立，并公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这样，就向全国人民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局面。所以有人说梁漱溟从来没有为人民做过一件好事，这不是实事求是的说法。梁先生对中国民主运动是做出了贡献的。

《华商报》与《光明报》在坚持抗战、坚持民主的立场上基本相同，当然《华商报》言论更左一些。这两个报是我们发表言论的园地，我也经常为他们写稿。

韬奋自生活书店在蒋管区被国民党反动派所逐个查封，一些工作干部被逮捕以后，于一九四一年三月间秘密逃来香港，即积极筹备《大众生活》在香港的复刊。《大众生活》于一九四一年五月

一日复刊，到同年十二月太平洋事变香港沦陷停刊，共出版了三十二期。《大众生活》设一编辑委员会，以韬奋为主编，编委六人：金仲华、沈雁冰、夏衍、胡绳、乔冠华、千家驹。编委中除韬奋为专职外，我们每个人都各有工作岗位，编辑委员不过于每星期六上午开会一次，讨论一下下一期的主要内容，并商量如何组稿和约稿，开会时除编委外，徐伯昕和一个助理编辑程浩飞列席。在这期间我与韬奋的接触较多了，我逐渐认识到韬奋这个人是很风趣的，他不仅平易近人，而且谈笑风生，极易相处。他有时讲起笑话来更妙语如珠，挖苦国民党官老爷入木三分。在政治性原则问题上，则严肃认真，从不拿原则去做交易。在抗战前蒋介石一再想收买他，有一次叫杜月笙陪韬奋去南京见他。杜老板拍着胸脯担保：陪韬奋去，又陪他回来，安全绝对无问题。杜月笙还挂电话通知戴笠去南京车站接车。但韬奋坚决地拒绝了，因此他不得不流亡海外。又当韬奋于一九三六年在香港办《生活日报》时，广东军阀陈济棠特地派副官接韬奋去广州一谈。事后要送他三千元，韬奋亦婉辞谢绝了。即在生活细节上，韬奋亦非常认真，一丝不苟。有一次在九龙我们几个人一同坐公用汽车，到站后售票员亦未来售票，我们都已经下了车，韬奋还要掏钱买了票再走。正因为韬奋不肯为国民党所收买，所以蒋介石恨韬奋入骨，当香港沦陷后，港九文化界人士返回内地时，蒋介石电令各地方当局发现韬奋即就地正法，因而韬奋不得不去敌后隐蔽起来。

我于一九四一年三月间把家眷从桂林接到香港来了。我的家眷是老母亲，爱人以及我的儿女共六七口人。这样一个六七口之家，靠卖文为生是很不容易的。我不得不整天忙着为各报刊写稿。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宋庆龄先生。我与宋先生素昧平生，宋当时正侨居香港，通过朋友的关系，宋庆龄委托我为“保卫中国同盟”整理一份材料（“保卫中国同盟”是宋先生主办，专向海外捐款以帮助解放区福利事业的组织）。工作量并不大，稿子交去之后，她立即派人送给我一笔特别优厚的稿费（数百元港币）。这是她对我的特

别照顾。我至今铭感在心。

此外，我还为香港《大公报》每周写一篇社论。《大公报》是政学系的报纸；《大公报》三巨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均与蒋介石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小骂大帮忙。《大公报》执蒋管区舆论界之牛耳，貌为“大公”，有时起《中央日报》（蒋党机关报）所不能起的欺骗作用。但另一方面，《大公报》所代表的政学系与四大家族的宋、孔、陈之间是有矛盾的，张群、吴鼎昌、张公权等代表中国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不满意四大家族的胡作非为，他们之间的斗争有时是很尖锐的，可以利用这种矛盾来暴露一些国民党政权贪污腐化的内幕。

《大公报》分“重庆版”、“桂林版”、“香港版”，基本立场相同，表现形式则有若干的差别。一般地说，重庆版最为保守，因在国民党蒋政府直接控制下，言论特别慎重；桂林版便大胆些，桂林是桂系军阀的势力范围，言论较为自由。至于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读者对象主要是华侨，《大公报》香港版态度上就更为开明，有些自由主义的色彩。香港版经理为金诚夫先生，约我每周为《大公报》香港版撰社论一篇，专评论关于财政经济方面的问题，每月致稿酬港币六十元。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掀开了德苏战争的序幕，香港的火药味也一天天浓起来了。但当时谁也没有料到会有太平洋战争。十一月中旬日本政府派特使来栖去美与罗斯福总统谈判。在这一谈判的烟幕弹下，甚至当十二月八日日本炸弹投到九龙启德机场的时候，人们还以为英国军队进行演习呢！

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

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港、九即为日军所占领。一个歌舞升平的美丽城市顿时变成死气沉沉的死城，所有商店关了门，日用必需品买不到了，满街都是垃圾、废

报纸之类的东西。每个市民欢乐的笑脸不见了，代之以愁容满面，不知所措的表情。我才体会到战争的可怕，再没有比战争改变一个城市的面貌更为迅速的了。几乎在一天之内，什么都变了样。我们朋友所办的报纸、刊物全部停了刊，朋友们隐蔽起来了，有的搬了家，有的人躲在防空壕里，每个人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是住在九龙的，日军先占领九龙而后占领香港。当日军尚未进城而英国军警已开始撤退的青黄不接时刻，九龙成为“烂仔（流氓）世界”，抢劫公行：一夕数惊，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我家里也遭到两次洗劫，不过他们的目的只在于抢东西，如不加抗拒，他们并不打人、杀人。两次都是在深夜破门而入的，当时已没有供电，我躲在写字台后面未被发现，我妻梨音化装为女佣，亦未受盘问，烂仔进来后即翻箱倒篋，把比较值钱的衣物抢去，一批走了之后，再来第二批。天亮之后，日军已经进城，秩序旋即恢复，从此暂时过着亡国奴的生活。

过不了几天，汉奸报出版了。忽有一天，在汉奸报上看见汪精卫伪组织派了四名大汉奸来“慰问”港九侨胞，其中有一名是陈君慧；还有三名是陈耀祖、林柏生、陈春圃。陈君慧是我六七年前在社会调查所的老同事，与我同房办公有二三年之久。我想万一被他发现我在香港，岂不糟糕。我非赶快逃离香港不可，但正当这时，梨音又怀孕了。在这兵荒马乱之时，不能再有孩子了。但在香港，人工流产是非法的，后来托了朋友，以一百港元的代价，让梨音堕了胎，胎儿已经有三四个月了。

香港沦陷之后，居民最困难的是粮食恐慌。日军一进入香港，立刻把香港全部存粮封存起来以供军用。所有粮店都关了门。这时街上就出现一些零售米、面的小摊，大多一二十斤、二三十斤一堆，价格比平时提高一倍，米中杂以糠麸，面粉中搀杂石灰，在偏僻的地区，小孩失踪，出卖人肉的事也时有所闻。我虽在战争以前刚好买了一百多斤大米，但因人口多，不久也要吃完了。有一朋友在港候船去美深造。战争发生后，美国去不成了，他用美

金在小摊上换了一点米送给我，还有一位姓陈的朋友也给我送一些米来，使我幸免绝粮之虞。

战争一开始，我的收入完全没有了，幸亏冯和法先生在战争刚爆发时就送我一张五百元的大额钞票。但这时大钞已不通用，换成小钞要打六折，银钱兑换业趁火打劫，我不得已只有用大钞换了三百元小钞勉强度日。

为了减轻港九数百万人口的粮食负担，日军占领当局有意识地疏散人口，无论经由陆路或海道返回中国大陆，他们非但不予以制止，反而加以鼓励。一九四一年流亡在港九的大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之所以能返回祖国，这是主要原因。当时从香港返回内地，一路是经由广东东江游击区，一是经由广州湾（水路）。经过东江必须步行，我因母老子幼，梨音又人工流产不久，根本不可能长途跋涉，所以决定经广州湾走。其他朋友多数是由东江游击区回内地的。

有一天，当我正在九龙地摊上闲走时，遇见一个手拿扁担类似农民装束的青年，他问我是否即为干某人，我答是的。他就到我家里，问我准备怎么走，我告以拟坐船经广州湾回桂林。但川资还不大够。他答应为我想办法。次日他给我送来港币四百元，这是一笔不少的数目。我也没有问他姓名住址，我知道他是代表地下党的，即使问他，也不会告诉我真实姓名的，大家心照不宣。我知道所有进步文化人之所以安然离开沦陷后的香港返回祖国，都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的。有了旅费，我买了去广州湾的船票，在一个初春的早晨，我离开香港去了广州湾。

这一次我流亡香港的时间恰好一年。

回到桂林以后

这次我回到桂林，与我上次来大不相同了。上次是作为广西省政府的“客卿”礼聘来的，这回却作为一个“难民”从沦陷区

逃了回来。广西当局对于我的工作与生活当然不闻不问。此时从香港逃回桂林的国民党元老有何香凝、柳亚子，民主人士和地下党有沈雁冰、范长江、金仲华、梁漱溟、沈志远、陈此生、杨东莼、夏衍、张友渔、萨空了等人。广西建设研究会虽没有过去那么活跃，终算仍在李任仁、陈劭先主持之下，掩护朋友们做些进步的文化工作。当时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已经过去，从香港返回祖国的进步文化人士，除对邹韬奋，蒋介石曾有密令拿获即就地正法之外，其余的人，一般不加以干涉。只有廖承志回内地后即被国民党反动派所逮捕，押在江南某地监狱。蒋介石希望返回祖国的进步民主人士都去重庆，以便就近控制和监视。他曾两次派代表前来桂林劝驾。第一次派的是CC骨干分子刘百闵，第二次派的是与桂系有密切关系的程思远。他们两人都到我家里来过。据说，重庆政府还特地有电报给广西当局，叫他们不要安排我的工作。其目的就是要封锁我的生活来源，使我无法生活。湖南某师范学院听说我回到桂林，拟聘我去教书，事为CC头子陈立夫所知，立即加以制止。这样一来，我在桂林就变成一个“无业游民”了。记得刘百闵劝我去重庆时，曾对我说：“你不过写了一些文章批评孔部长(孔祥熙)。陈豹隐不也批评过政府吗？经孔部长与陈豹隐面谈了之后，陈先生对政府完全了解，现在还当了财政部顾问呢，你只要去重庆与孔部长当面谈谈，中央一定会借重你的。”我听了之后，只有一笑置之。

经刘百闵与程思远两次来桂林动员的结果，一部分原来在重庆工作流亡到香港的朋友回到重庆去了。一部分原来在桂林的或不愿再去重庆的则在桂林留了下来。继续留在桂林的朋友有何香凝、柳亚子、金仲华、萨空了、梁漱溟、陈此生等人。我因在重庆无亲无故，在桂林人事关系较熟，自然留在桂林不走。后来据去重庆的朋友写信告诉我说，国民党政府设置一个什么“文化设计委员会”，安置这批进步的文化人，聘他们当“设计委员”，月致车马费法币二百元，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约相当于抗战前的二

三十元。“蒋委员长”还每人单独接见了一次，谈话约二三分钟。

我不愿去重庆，但在桂林又无工作岗位，生活是很成问题的。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冯和法同志。冯和法在我流亡香港时期便帮过我的忙，此时他在桂林与友人合伙开书店。他慨然答应每月负担我生活费法币五百元，相当于战前购买力六七十元。冯和法自己也是文化人，不是富商巨贾，不过他同几个朋友合伙做生意，有些周转能力，这真叫雪里送炭，患难中见友谊。此外就靠我自己卖文添补生活。我一家七八口人，国民党区通货膨胀，物价不断上涨，卖文谈何容易，图书杂志新闻检查严密，我不得不经常更换笔名发表文章。

一九四三年我把全部藏书卖给广西大学图书馆，卖了一二千元，这些书本是我的精神食粮，现在却变成我的物质食粮了。其实，这时候，不要说我这样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即在职的大学教授，亦莫不受通货膨胀的压迫，实际工资不及名义工资的二三成，生活痛苦不堪，其狼狈情况亦不下于我，西大不少教授还为我的卖书而眼红呢！

香港《大公报》自香港沦陷后停刊，工作人员全部撤退到桂林，参加《大公报》桂林版工作，他们要我继续为《大公报》撰述社论，每周一篇，亦每月送我一点稿费。

我有一部《财政学大纲》的讲义稿子，想卖几个钱，但书店不敢出版。当刘百闵来桂林时，他说《中国文化服务社》（CC分子所办）可以出版，并可预支一部分稿费。那知我把稿子寄到重庆后，不久给退回来了，说其中有“阶级斗争”观点，重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通不过，预支稿费的事当然谈不到了。一九四三年有一位姓曹的同志筹备开一个书店，把我的稿子要去，书还未付印，便先送我稿费二万元，我知道这是地下党对我的支援。这部稿子直到解放以后，才由三联书店为我出版，这已经是一九四九年的事了。

没有学校请我教书了，但朋友们还为我组织了几次学术演讲

会，听讲的人要买票，一元一张，居然亦有数百人来听讲，除支付会场租金外，全部卖票所得归主讲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先贴出海报，定期卖票，像看电影一样，但听众完全是自愿的，丝毫勉强不得，我在每一场演讲后可以得二三百元酬金，亦相当于战前的二三十元。

总之，那时我完全靠打杂来维持生活，没有正当职业，没有固定收入。但桂林忽然有一位西南区税务局的程局长，要我去税务局担任工作，什么工作没有说，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研究财政的，税务亦属财政的范围。我对他说：“我不担任任何名义，可以提供意见，如果担任正式名义的话，怕重庆政府通不过。”这位程局长当面拍胸脯对我说：“重庆方面决无问题，我可以担保，只要你答应担任名义。”这倒使我警惕起来了，我想，蒋介石政府封锁我的生活来源，不许广西当局安排，连李、白、黄广西地方军阀巨头都不敢负责，区区一税务局局长竟敢担保重庆方面决无问题，一切包在他身上，其来头之大，可想而知了。除非军统或中统方面的重要负责人，别人决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当时许多财政、税务、盐务机关的负责人均为军统分子）。要么，就是故意做成圈套，让我上当，所以我坚决拒绝了。程局长看到我不肯担任任何名义，也就不再找我了。

桂林紧急疏散

一九四四年五月日军大举向湘桂路进犯，六月敌长驱南下，如入无人之境，六月十九日长沙失守，六月下旬衡阳防御战开始，八月七日衡阳国民党守将方先觉投降，衡阳沦陷。衡阳为桂林的屏障，衡阳一失，桂林顿呈紧张状态，九月敌军进至黄沙河，桂林开始紧急疏散。

当时我对日军打通湘桂路的决心估计不足，衡阳的防御战又拖了一两个月，所以我对桂林的疏散是毫无思想准备的。梨音肺

病复发，卧病床上。我既无钱看病，当时对肺病也无特效药。我请桂林医院内科主任程大夫来看，他建议不必吃药，卧床静养，多吃番茄，以增加自然抵抗力。好在桂林有的是番茄，物美价廉，梨音又特别爱吃，慢慢便好起来了。

我对桂林沦陷既无思想准备，这时正打算办一《经济通讯》，写了一份“缘起”，我的计划是搜集经济动态材料，加以分析，专供各企事业单位及私人参考，并不公开发行。预收订费以供开支。我请友人刘思慕同志为编辑助理，我办了两期(周刊)，各方反映还不错，正拟筹集基金，扩大影响。我与思慕同志去柳州筹款，因为柳州有不少华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亦设在柳州，那知我们去了柳州还不到一礼拜，桂林便紧张起来了，我赶快回到桂林，桂林已进行紧急疏散。《经济通讯》的出版根本谈不到了。桂林城防司令韦云淞，是新桂系重要骨干，与我有数面之交，我去找他，他也劝我早日离开桂林，走为上策。但离开桂林疏散到哪里去呢？往西走吧，那就到重庆，但重庆我不愿去，且人地生疏，无亲无故，兼之我也搞不到交通工具。幸亏我没有往这条路走，那次湘桂路的大撤退，是我国抗战期间最惨的景象之一，沿途难民拥挤，死亡枕藉，从桂林到柳州这短短的一段路，火车和公路上满是难民，平时不过五六小时的路程，这时走十多天也到不了。我决定不往西走，而顺桂江东下，走平乐、昭平这一线。这里我不能不特别感谢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桂林分会的张锡昌、周康仁几位同志。他们雇了一条大船，疏散工合物资，准备去桂东南的昭平。他们约我全家同行。“工合”是抗战期间中外进步人士合组的经济组织，有不少中共党员参加在内，桂林工合的负责人为陈翰笙、孟永潜、勇龙桂等，均为地下党员，我相信这次我自桂林疏散得以搭工合的便船，且不收分文的代价，亦是出于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抗战期间，我数度流亡，一再疏散，地下党组织虽从未露面，但我总是感到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使我得以逢凶化吉。我不像梁漱溟那样，说这是“天意”。梁漱溟于香港沦陷后从沦陷区逃回大后方时，

把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忙，说成是“天意”，他在给儿子的公开信中说：他是不会死的，因为他死了，“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因之改辙”，所以每逢危难之际，总有不相识的人出来帮忙。

工合的船停在漓江码头，但由我住处到漓江码头还有二三里地，梨音卧病在床，不能步行。平时桂林有的是人力车，再不得已还可以雇轿。但当紧急疏散时，人力车已经绝迹，轿也没有了，汽车更谈不到，除军政要人，谁也没有私人汽车。好容易我向朋友借到一辆人力包车，总算把病人拉到码头。我同年已古稀的母亲、小孩都是步行，枝柏才四岁，托一工人背着，在码头上船时一不小心，工人和枝柏都掉到江中去了，好在那是夏天，立刻被水手捞上来了，这也可见当时慌张狼狈之状了。

一上了船，我们便安心了。梨音的病由于精神上不再紧张，居然很快好起来了。我们顺流而下，第三天便安抵桂东南的昭平。

从昭平到黄姚

昭平处于桂江中游，在桂林与梧州之间，这是一个三等县城。疏散到昭平的朋友倒也不少，有何香凝、陈劭先、欧阳予倩、张锡昌、莫乃群、胡仲持、周康仁、陈晖等等。这么一个小山城，忽然来了这么些大小人物，住房的紧张，可以想见。昭平当局把何香凝一家和我一家安置在昭平国民小学内，学校当然早已停了课，我们就住在教室里。昭平县长韦瑞霖，年青颇有朝气，还有一个当地绅士名严子方，是蒋政府的立法院委员，亦富有爱国主义思想。此时广西绥靖公署和广西省政府都已疏散到桂西北边地的百色、桂林与柳州，南宁均已沦陷。百色与昭平隔着广西的湘桂路沦陷区，昭平已成敌后，尽管这里敌人尚未到过。为了昭平的自卫，韦县长与严子方等约集疏散到昭平的爱国人士（陈劭先、欧阳予倩、张锡昌、莫乃群和我等）成立了一个“昭平自卫工作委员会”，韦县长并拟组织青年军，训练青年，以资自卫。但桂省军阀是不

甘心放弃它的统治权的，不久，广西绥靖公署便在昭平设立了一个“民团司令部”，委派桂系土豪蒋如荃为民团司令。蒋如荃无一兵一卒，完全是个光杆司令。广西当局不过给他一个名义，拨给他一笔经费，叫他自己招兵买马，成立部队。听说这位蒋司令领到经费后，立即全部给他老婆儿媳妇购置了金银首饰，就走马上任来了。他根本没有组织部队的思想，但这样一来，我们在昭平想搞的武装自卫便搞不成了。这是国民党一贯的敌后工作作风，叫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蒋如荃的民团司令部也设在昭平国民中学内。国民中学既是何香凝和我两家的宿舍，又是民团司令部，住家和军事机关在一起，本是不大合适的。何香凝带的两个孙子（即廖承志的儿女）晚间经常啼哭，打搅了司令老爷的清睡。蒋如荃想把我们两家撵走。他想，只要把何香凝一家撵走，我的一家就不成问题了。于是，蒋司令就派了韦县长去向何香凝说，准备为她另找房子。何香凝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抗精神一向是很强烈的。她一听说要让她搬家，就发起脾气来了。她说：“不要说区区一个民团司令，即使张司令长官（张发奎当时是华南最高的军事首领），我相信也不至于对我下逐客令吧！既然你们不欢迎我住在这里，那为我预备交通工具，我立刻离开昭平。”这一下使这位蒋司令很难下台了，他派人向何香凝再三道歉解释说：这是韦县长不善辞令，把话传错了。像廖夫人这样年高德劭的党国元老，我们欢迎之不暇，那有逐客之意呢，司令的意思是说给廖夫人住在国民中学，实在太委屈她老人家了，应该为她找更合适的房子。但何老太无论他们怎样解释，也不愿住下去了，不久她迁移到八步去了。何香凝一搬走，我也只得搬家了，他们给我安排到新国民中学去住。

但敌军又有进犯昭平的企图。昭平是根本没有部队的，只有几个民警，韦县长本想组织青年军，但一无枪支，再无经费，蒋如荃的民团司令不过养了几个秘书副官之类的官僚，更谈不到自卫，我们只有再作进一步的疏散。在昭平东八十里，有一小镇名

黄姚，此地交通极不方便，既不通公路，也不通民船，除步行外，别无其他交通工具。这是很不利的条件，但作为躲避日军的铁蹄，却是最理想的所在。因为这样偏僻的山区，日军是决不会去的。我们全家于一九四三年一月间再来一次大搬场，我给母亲和梨音雇了两顶山兜（用一木椅，两边绑上两长竹竿，用人抬着），小孩们用箩筐挑，我自己则步行，翻山越岭，幸亏我小时养成走路习惯，八十里山路亦并不以为苦。

黄姚镇内仅百数十户人家，人口不满一千，虽然在山沟沟里，但山清水秀，有很整洁的石子路。我去时恰好过春节，家家户户请我们吃饭。我租了一幢小楼房，我住楼上，张锡昌一家住在楼下。门前有一条小溪，溪水清澈，既供饮用，亦供洗涤，民风淳朴，真有世外桃源之感。当时疏散到黄姚的朋友有欧阳予倩夫妇，莫乃群、周匡仁、徐寅生等人；何香凝、陈劭先则疏散到八步去了。

黄姚的风俗是很特别的，妇女参加劳动，男人则在家抱小孩，做些家务轻活。妇女们上山打柴，负薪七八十斤，走五六十里路，毫不在乎。杜甫在“负薪行”一诗中说：“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应当门户女出入。十犹八九负薪归，卖钱所得应供给。”竟可为黄姚妇女的写照。不过黄姚妇女不是不出嫁，而是嫁了丈夫之后，丈夫在家闲荡，无所事事，女的上山打柴，“卖柴所得应供给”，不同于夔州“处女”而已！

在黄姚住下之后，当地群众觉得我们这些文化人来到黄姚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是抗战决不会到这里来。当地文化落后，连一座初级中学也没有。小学毕业要进中学非得跋涉百来里路或去昭平进国民中学，或去八步（属贺县）进普通中学。他们想借我们的东风，为他们创办一所中学。他们愿意把黄姚镇镇公所让出来作为校舍，捐出几百担谷子来作为学校基金。有钱、有房子、又有人，事情便好办了，于是成立了一个校董会，校董会推举我为

黄姚中学校长。众擎易举，不到一个月学校便开学了。当地无国民党官僚机构，又不须立案的手续。学生是现成的，失学的小学毕业生很多，教员则请疏散到黄姚的朋友担任。

我们还在当地办了一份日报。说起办报来，也是机遇很巧的。广西原有一份《广西日报》，为广西省政府的机关报，桂林疏散后，《广西日报》的全部机器、编辑人员均随广西省政府疏散到百色去。仅主笔莫乃群同志（解放后曾任广西省副省长）随同我们疏散到黄姚，他当时是个无产者，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恰好这时候有一印刷厂从桂林疏散到平乐后，因资金匮乏，无力继续搬迁，机器放在船上，印刷工人全部失业。我们考虑，如能利用了这部机器办份小报，既宣传了抗战，又运用了机器，使印刷工人有工可做，不是一举数得吗！该印刷厂的经理也是地下党员，一谈便妥了，他们不要分文租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再疏散的话，得把机器运走。有了人，有了印刷机器，但新闻来源呢？黄姚在山沟沟里，根本没有一个新闻通讯社，穷乡僻壤，连一架收音机也弄不到，就是有收音机也没有电源。真是无巧不成书，刚好广西省政府教育所电化教育室的负责人陈先生，带了一部收报机，随同我们疏散到黄姚。他是技术人员，可以收报。这一下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至于编辑人员，还有一位办报老手胡仲持（胡愈之同志之弟）也同我们在一起，他是上海新闻界的老资格，莫乃群原是广西日报的主笔，写稿子的人更不成问题。于是在极短的时期之内（不到一个月），《广西日报》昭平版便在黄姚出版了。

我们为什么用《广西日报》昭平版这个名称呢？因为《广西日报》原是广西省政府的机关报，莫乃群又是原《广西日报》的主笔，如果另用一个新的报纸名称，会被别人误会有何政治背景；同时陈劭先先生是昭平版的总负责人（我不记得是什么名义，“社长”或“董事会主席”），他利用与桂系当局的关系打一电报给百色的桂省当局备了案，以取得昭平版发行的合法地位。

当我们的报纸刚出版时，当地群众不能理解怎么世界各地（如